

论晚唐小说《东阳夜怪录》主题与创新成就

周承铭^{1,2}

(1. 长春社会主义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41; 2. 长春中华文化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41)

[摘要]《东阳夜怪录》是一个有关士子科举的故事, 科举是潜藏其中的重要叙事线索, 决定故事的起因和发生发展; 是一个发生在两京大道的故事, 反映奔走道路的艰难困苦与悲伤感慨是人物对话的焦点和小说的主要内容; 是一个反映求仕悲辛的故事, 在主人公遭受饥寒、惊吓和屈辱以致身心俱疲的故事中隐含着求仕者的失落与悲伤。描写往返科举道路经历的艰辛困苦、意外惊吓与莫名屈辱, 反映求仕者从身体到精神所遭受的折磨与痛苦, 发泄求仕失败的抑郁和悲伤, 是小说着意表达的思想主题。突出人物在故事中的主体地位和导向作用, 具有比较自觉的主观表达意图是小说最鲜明的个性特征与独特价值。

[关键词]《东阳夜怪录》; 主题分析; 创新成就

[中图分类号] I 204.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22) 04-0056-08

唐代小说中有一类着重讲述动物、器物或食物等非人类存在幻化为人形, 相互之间或与人类之间共同创制与吟咏诗歌的故事, 在唐代小说着意演绎人情世故的题材与主流之外独辟蹊径, 自成一脉。由于在内容与篇章结构上主要是凸显诗歌的地位和比重, 人物与故事多为解读诗歌而设置, 有类诗话, 因之, 将这类小说命名为“诗话体精怪小说”更为确切。这类小说大部分被《太平广记》以“精怪”为总题名编录在第368—371卷。此类小说兴于中唐, 盛在晚唐, 数量颇为可观, 其中有以单篇形式流传者, 但多数出自唐人笔记小说集。《东阳夜怪录》《元无有》《滕庭俊》《姚康成》《杨祯》《宁茵》等被视为此类小说的代表作, 《东阳夜怪录》的代表性在其中则更显突出, 因此也更受重视。他篇皆属短制, 此为长篇; 他篇皆属某集之一篇, 此为独立单行; 他篇所写精怪一般都是二三个, 最多不超四五个, 此则写有八怪, 人物之众, 诗歌之多, 乃居群篇之首; 他篇具有之特点, 此篇可谓无一或缺; 他篇不备之特点, 此篇却能独自拥有。就研究唐代精怪小说特别是诗话体精怪小说而言, 透彻研究《东阳夜怪录》, 确有举一反三、事半功倍的学术意义。

一、研究现状与存在问题

《东阳夜怪录》的研究历史, 若从明代胡应麟于嘉靖至万历年间著《少室山房笔丛》即有所评论算起, 迄今已逾400余年。这期间, 学术风格经历了从三言两语式的评点到辟以专题或著以专文详论的发展过程。

1. 以胡应麟为代表的彻底否定意见。认为唐代小说纪闺阁事者“绰有情致”, 相形之下, 《东阳夜怪录》《元无有》这类作品无论思想内容还是文章格调都一无可取, “至唐人乃作意好奇, 假小说以寄笔端, 如《毛颖》《南柯》之类尚可, 若《东阳夜怪录》称成自虚、《玄怪录》《元无有》皆但可付之一笑, 其文气亦卑下亡足论”^[1]。否定态度坚决而彻底。“可笑”“卑下”说, 对现当代学界影响巨大。汪辟疆《唐人小说》在《元无有》后附录《东阳夜怪录》, 按语曰: “即景抒情, 虽极奇辟, 冗而寡味矣。”^[2]¹⁹⁸王梦鸥《唐人小说校释·〈东阳夜怪〉叙录》亦云: “《太平广记》所收唐人小说, 如此篇者为数颇多, 甚且可以自成一系。盖其运思之要, 在乎‘谐辞’‘隐语’之间, 既无所诤讽于其间, 而情节又几乎千篇一律, 读之无以兴感, 所

[收稿日期] 2021-03-09

[作者简介] 周承铭 (1961—), 男, 吉林德惠人, 教授, 硕士, 主要从事中华文化与唐代小说研究。

谓“但可付之一笑”是也。”^[3]徐士年《唐代小说选》也认为胡应麟“持论颇有见地”，并进一步提出具体否定意见：“竭力搬弄了有关这些动物的典故，运用了拆字、谐声等许多方法，做出了一篇关于这些动物的文乎文乎的谜语。没有故事情节，对这些精怪的性格只稍稍点染了它们的特性，也不甚贴切。”就是纯粹的“文字游戏”和“游戏笔墨”，而且篇幅过于冗长^[4]。

2. 以鲁迅为代表的充分肯定艺术创新的意见。《唐宋传奇集》不仅收录了《东阳夜怪录》，并且对胡应麟的贬斥意见也不完全赞同，其《序例》云：“特《夜怪》一录，显托空无，逮今允成陈言，在唐实犹新意，胡君顾贬之至此，窃未能同耳。”^[5]指出小说绝非一无是处，所述八怪故事就具有创新意义，与胡应麟相比，评价态度有所保留，特别是从“新意”角度肯定了小说在艺术上的成就。艺术创新之说，唯见于鲁迅，鲁迅之后几无踵武者。

3. 近30年来兴起的全面肯定意见。进入新世纪后，受到时事变革与观念变化的时代潮流影响，学界全面肯定《东阳夜怪录》的意图十分明显。肯定思想内容者认为小说中个别精怪诗“既像咏物寓意，又像失意文人的咏怀言志，可以见出作者的孤愤和文才”^[6]。进而指出“《东阳夜怪录》借一群动物的幻化描写，真实地表现了下层知识分子的不幸感觉”^[7]。甚至有人还提出“特别表现出中唐之后朋党斗争的现象”^[8]一类观点。欲肯定艺术价值者提出了所谓“兴趣”“文趣”说，强调“《夜怪》诸作之妙，不在言理而在言趣，令读者赏玩事趣、文趣耳”。主张“不涉理念而专以奇趣、谐趣悦心，悦心者亦为文之道，不得谓明道述志止此一途也”^[9]，认为读者创造审美愉悦，发挥了小说娱乐功能作用即是这篇小说的存在价值。此说渐成近年学界的主流意见。

审视《东阳夜怪录》研究轨迹，则可发现，否定者的立论依据主要是基于思想内容上缺乏内涵的认识与评价，故有“可付一笑”“寡味”或缺少“讥讽”之说；肯定者的立论依据，则是避其思想内容不谈，只部分肯定或完全肯定其艺术造诣，遂有“新意”和“兴趣”之说。《东阳夜怪录》研究的核心与关键问题是，这篇小说

到底有没有值得肯定与研究的思想内涵？迄今为止，这个问题无论对于肯定者还是否定者都还没有真正解决。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语言艺术总是因思想情感表达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艺术性必须服从、服务于思想性的现实永远不能也不可改变，因此思想内容特别是思想主题的研究，又将直接决定和深刻影响包括艺术成就以及艺术特色在内的小说研究的总体面貌和研究水平。一些学者所提出的“作者的孤愤”“知识分子的不幸”以及“朋党斗争”，虽然触及对小说思想内容的重新认识和评价，但一则观点指向含糊，概括笼统，又缺少系统论证，故尚不足以成一家之言；二则均为放大局部内容和个别情节以作全篇与全部人物评价，存在以偏概全的偏颇；三则对小说真正的核心人物成自虚，特别是他与精怪人物、精怪故事的关系，缺少应有关注，或虽有所关注，但挖掘还很不充分，因此这样的研究等于是灭掉或无视一部分非常重要的思想内容的前提下的片面研究，这也是当前《东阳夜怪录》研究中存在的最为普遍和最为突出的问题。

二、内容解读与主题概括

综观诗话体精怪小说的思想内容与表达方式，可以比较鲜明地感受到一些具有标志性的共同特征或特点：（1）多为叙事主人公或线索人物于逆旅或客居中耳闻目睹之奇事。（2）所写精怪多幻化于夜晚，天明现形。（3）精怪原形多为粗鄙或腌臢之物，或为故杵、破铛、秃帚，或为猛虎、老牛、蚯蚓、苍蝇，故事发生地多在荒村、破庙、废宅，乃至污池、茅厕，呈现出有意追求老、旧、丑、脏等扭曲的审美取向。（4）皆以精怪之诗为叙事重点，这是此类小说最为本质的特征。故事展开都以精怪为主要人物，精怪活动又都以诗歌为中心，精怪作诗、吟诗、解诗、论诗构成了小说的主要内容和情节。从功能与性质上划分，每篇小说一般都是由诗歌背景铺叙、诗歌内容解读、诗人身份揭秘这样3组内容构成，亦即以诗为叙事核心，以铺叙—解读—揭秘为叙事脉络，是这类小说大体遵循的篇章结构模式。

《东阳夜怪录》也大体上遵循了这些共性特

征,同时又有较大的创新与突破。小说写的是进士成自虚因风雪夜行迷路投宿荒庙而遇病驼、脊牛、乏驴等八怪,并相与谈诗论文的故事。故事发生在成自虚自京还乡途中的一座废寺荒庙内,主要人物是叙述者与八怪,主要故事情节是听八怪诵诗、解诗、评诗以及由此展开的一系列矛盾冲突。八怪之诗是小说的核心内容,4 000余字的篇幅,共穿插了14首诗,平均每300字就会出现一首诗,为同类小说之冠。作为诗话体精怪小说中的重要一篇,淋漓尽致地反映了同类小说的共性特征,具有极强的代表性。相比于共性特征,小说的个性特征则更有价值,特别是思想内涵也更为丰富。比起只以猎奇为追求、以逞才为目的、以谐谑为旨趣的大多数同类作品,它在猎奇、逞才、谐谑的表面下,再现的是叙述者难忘的人生经历,寄寓的是特殊的人生体验与感慨。

这是一个有关士子科举的故事。从整个篇章结构角度看,这篇小说写的乃是一个参加科举的“进士”(成自虚)向另一个参加科举的“进士”(王洙)述说科举路上曾经经历过的奇遇与感慨的故事,叙事方式是以记录其中一人倒叙往事的形式再现发生在往返赶考路上的一次离奇古怪的遭遇。

小说中共有两个叙述者,就八怪故事而言,叙述者是成自虚,就整篇小说而言,叙述者则又是王洙。成自虚以既是叙述者又是实际经历者的双重身份成为小说故事的主人公,王洙则以记述他人经历的第三者身份成为小说中的叙事主人公。唐代科举规定“凡未有出身、未有官,如有文学,只合于礼部应举。有出身、有官,方合于吏部赴科目选。”(《唐会要·贡举下·科目杂录》)^{[10]1201}小说所反映的正是京外十道州府士子赴京科考的旅途经历、生活情景与人生感受。

关于东阳遇怪故事,小说先后交代了两个时间和两个地点:一个是全篇叙述者交代的时间与地点,即小说所谓“前四年时”之“荥阳逆旅”;一个是具体故事叙述者交代的时间与地点,即元和八年(813)十一月九日(小说所谓“翼日”)之京兆府渭南阳县东阳驿附近之荒野废庙。成自虚是“彭城客”,王洙“居邹鲁间名山习业”,二者山水相隔,素昧平生,不是因为参加科举考试,“随籍入贡,暮次荥阳逆旅”^{[11]109},

根本无缘相遇并相识,更不可能有机会在一起共话“辛勤往复”的经历与感受,也就不可能让一段离奇怪诞的故事公诸于世。“科举”是潜藏在整个故事中一条最重要的线索,对故事的起因、发生发展均有决定性作用,就故事主人公成自虚而言,不为科举,何来“辛勤往复”,不是“以家事不得就举,言旋故里”,又怎会在狂风暴雪夜独自前行以致在“四绝亲邻”的废庙遇到骆驼、牛、驴、猫、狗、刺猬等家畜与野兽借助黑夜成精作怪。“进士”“随籍入贡”“辛勤往复”,无疑是支撑整个故事的3个关键词。

这是一个发生在两京大道上的故事。具体言之,是名利客独行两京道、风雪夜遭遇精怪的故事。从京师长安至东都洛阳的道路是当时全国最重要的“官道”,时称“两京大道”,向东直达汴州,是两河、山东、江淮、吴楚,甚至岭南等进出京师的必经或首选之路,沿途设置用以接待供给公私行旅的大小驿馆数十座(《唐会要·御史台中·馆驿使》)^{[10]905}。东阳遇怪故事就是因行走这条大道而发生。具体发生地是两京大道渭南一段之东阳驿南“去驿不三四里”处;实际缘由是故事主人公成自虚因急于赶路,独行两京大道之东阳驿与赤水谷口间,时值夜黑风高,“飞雪霏天”“行人已绝”“不知所届”,因之投宿于“下坞”之佛庙。

小说题目中之“东阳”,非谓浙江东道婺州之东阳县,乃指两京道上的东阳驿。此驿因地临渭河支流东阳谷水而有是名。故事主要由行路之事与行路之人而引发,故事中的人与物亦无不与道路有关,或在当下或在过去都是奔走于两京道上的追名逐利客,如成自虚、病驼、脊牛、乏驴,或是与两京大道比邻而居,冷眼旁观往来名利路上各色人等的喜怒哀乐,如狗、猫、鸡、刺猬。“自虚过其下,群犬喧吠,中有一犬,毛悉齐踝,其状甚异,睥睨自虚”^{[11]114}。故事中人物身世阅历各不相同,其所撰制或吟诵的诗歌思想内容也不止一端,但总体上乃是以羁旅经历与羁旅生活为主。

行走在两京道上的是不同身份和不同目的人,当然也会有各类交通运输工具,除了马、驴、牛,骆驼也是当时所常见的交通运输工具之一。幻化为“老病僧”智高者,就是村中“庄

家先有一病橐驼”^{[11]109}，生在碛西，“本因舍力，随缘来诣中国”。古代“中国”，盖指以洛阳与汴州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广大区域，两京大道恰在其中。骆驼是典型的役畜，驮运、乘骑是其重要功用，沿路“庄家”蓄养不能耕作的骆驼自然是要用以贩运牟利。智高名下有诗3首，其中《聚雪为山》主要述说身世来历，另外2首的主旨则皆在反映羁旅艰辛，其中“无定踪”“休行道”“头陀”等词语虽用作双关，但具体指向还是着重在行路之事上。“桃林客，副轻车将军”朱中正，则是“庄家”蓄养于道边柴栏旧圃中的一头病牛所幻化。“桃林客”，典出《尚书》：“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尚书·武成》）是借用周武王放牛之地暗示“牛”之身份。古人所称“桃林”，既指桃林之野，也指桃林之塞。桃林之野，史籍又有作“桃林之墟”或“桃林之丘”者，“在陕州桃林县西至潼关”“广阔三百里”范围内（《括地志》卷三引《山海经》）^{[12]113}。唐河南道陕州灵宝县因地处古桃林之野，故原名桃林县，隋开皇十六年（596）置，天宝元年（742）其地掘得天宝灵符，始“改县为灵宝”^{[13]158}。桃林塞，“在长安东四百里”，“自县（指灵宝县）以西至潼关，皆是也”^{[13]159}。“潼关……古桃林塞也”^{[13]35}。据今人考证，桃林塞实即崤函古道^[14]，因先秦时该处为扼守关中之军事要塞，乃有是称。崤函古道至唐已与两京大道相重合，为潼关至洛阳段的一部分。要之，所谓“桃林客”实乃指牛驾车出入桃林塞（潼关）、穿行桃林野的羁旅劳役，其自命官衔“副轻车将军”恰可印证。“黍稷兹农兴，轩车乏道情。近来筋骨退，一志在归耕”^{[11]112}。朱中正名下的这首诗，不仅表明其身份为拉车之牛，而且充分表达出对奔走道路的厌倦和对归耕田园的向往之情。“前河阴转运巡官，试左骁卫胄曹参军”，卢倚马，原是“河阴官脚”中的一头乏驴，因“不任前去”，村叟“哀其残命未舍，以粟斛易留之”。“河阴”，乃“河阴转运院”之省称，《旧唐书·宪宗本纪》“辛亥，盗焚河阴转运院”即指此，是唐时建于关中与江淮之间的重要仓储和转运机构，隶属盐铁转运使司，置有转运留后或转运使判官署理。卢倚马所云“近

蒙本院转一虚衔”之“本院”指的就是河阴转运院。其名下之2首诗可谓道尽奔波路途所经受的风尘、困顿、饥馁与离群索居的孤寂之苦。

纵观这篇小说，不难发现其描写的人物群像明显分作2类。一类是作为羁旅主体而存在的，他们行走于道途之上，有着丰富的羁旅经历与深刻体验，其中包括叙述人与骆驼、牛、驴等役畜在内。“客”是这一类人物的共同身份，如成自虚是“彭城客”，朱中正正是“桃林客”，智高与卢倚马虽没有被称为“客”，但对于距离东阳驿“不三四里”的彭特进庄而言却都是因行走道路而落脚于此的外乡客。智高、朱中正、卢倚马以及成自虚这一类人物尽管出身不同，阅历各异，但在漂泊异乡、奔波道路这一点上则完全一致。他们诗歌的主题都是厌倦红尘羁旅，向往闲适散澹自由。他们之间的话题也都始终没有离开行路之事，特别是始终以奔走道路的劳苦困顿与悲伤感慨为焦点，如智高与成自虚的对话：“雪若是，复当深夜，客何为者，自何而来？”^{[11]109}卢倚马与成自虚的对话：“客何故蹢躅然犯雪，昏夜至此。”^{[11]110}智高与朱中正的对话：“高公曰：‘……只如八郎，力济生人，动循轨辙……’中正对曰：‘以愚所谓，覆辙相寻，轮回恶道，先后报应，事甚分明，引领修行，义归于此。’”^{[11]111}而卢倚马与智高的对话则更为明确具体，从而也更为典型：“倚马曰：‘师丈骋逸步于遐荒，脱尘机于维系，巍巍道德，可谓首出济流。如小子之徒，曷敢窥其高远哉！倚马今春以公事到城，……旦夕羁旅，虽勤劳夙夜，料入况微，负荷非轻，常惧刑责。……昨夜出长乐城下宿，自悲尘中劳役，慨然有山鹿野麋之志。’”^{[11]110}“长乐城”，王梦鸥校改为“长乐坡”^{[3]359}，是也。走两京道，东出京师的首个驿站即是长乐坡，长安人饯送远行客常以此为分别之所，白居易名句“终日坡前恨离别，谩名长乐是长愁”（《长乐坡送人赋得愁字》）即为此而写。卢倚马的这段话既代为交代了智高的本来身份、体形特征和过去现在的状况，也高度概括了他自身经历的劳役之苦，负荷沉重而俸料微薄，疲于奔命却常遭刑责，憩息长乐坡下而更觉负重驱驰，老却一生，有苦无乐，苦不堪言。

另一类是作为羁旅环境与背景而存在的。他

们本身不行走于道途,但代表的却是行走道路者生活的环境与背景因素,或者说是作为羁旅生活环境与背景的化身,如敬去文、奚锐金、苗介立以及胃氏兄弟,他们既彼此齟齬争斗不休,又互为莫逆,难舍难分,由此构成的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既是故事的重要内容、诗歌的重要背景,也是第一类人物抒发羁旅悲辛的重要对象,同时也折射出当时与道路、风雪、鸡犬猫等家畜,甚至野兽等自然与社会环境为伍的既枯燥乏味又随时可能遭遇不测风险的羁旅生活实景。这一类人物在小说中显然居于从属地位,但又并非无足轻重。

这是一个意在反映求仕悲辛的故事,是一个求仕的文人士子屡试不第,空劳往返,徒受旅途冻馁惊吓以致身心俱疲的故事。故事是以八怪各现原形,而主人公“不胜一夕之冻乏”“馁冻且甚”,特别是受到严重惊吓,“心神恍惚”“如丧魂者数日”,失魂落魄,连续多日心神不宁为结局,在意外惊吓和莫名屈辱(竟遭粪堆上觅食的野狗“睥睨”鄙视)之中隐含求仕者的失落与悲伤。

这样的故事结局与其他同类小说相比,有很大不同。《元无有》《滕庭俊》《姚康成》《杨祯》《宁茵》等这些小说中的精怪对人类即使无益但也无害,那些精怪最终不仅没有给人造成消极影响与消极后果,有的还给人带来意外惊喜,如“滕庭俊先有热疾,自此已后顿愈,更不复发矣”(《玄怪录·滕庭俊》)。《东阳夜怪录》中的八怪虽然也同样没有害人的主观意图,但客观上却给人带来了不小的心灵与精神伤害,与人类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对立与冲突。成自虚的遭遇正是求仕者在求仕道路上历经艰难困苦与折磨、身心俱疲的生动反映。小说开篇所云之“辛勤往复之意”实即此意。考取明经、进士者叫做“有出身人”,未中第者叫做“白身人”(《唐会要》卷74—77、《册府元龟》卷629—641)。“白身人”是没有资格成为流内官的,缘此,“明经”“进士”的称谓极为当时社会所看重,寻常人等是轻易不敢冒充的。小说写的就是身为进士的“有出身人”赴京参加吏部选官考试途中发生的故事。故事主人公成自虚自报家门是“进士成自虚”,同时小说又明确交代逆旅对

话的另一人物王洙的身份也是进士,不过是因倒叙故事的章法需要而被称“前进士”。《唐摭言》有曰:“得第者谓之前进士,……近年及第,未过关试,皆称新及第进士。”^{[15]1578}据此,成、王2人当时身份为进士无疑,是为参加同一年的吏部铨选考试才不期相遇于荥阳逆旅。

2人之不同是,王洙有机会参加此次铨选,而成自虚却因家中突有变故而无缘当年科场;2人之相同是,皆数次颠沛于漫长而艰辛的科举路,却年年以考场失利而告终。据小说开篇交代,是年王洙赴考仍是铨羽而归。唐代的科举都要求应试者在前1年冬季到京集结,履行必要的手续和参加必要的活动,如核验履历、参加祭孔、觐见皇帝等,第2年春季方能参加考试,是称“朝见”或“冬集”(《唐摭言》卷1—3、《唐会要》卷74—77、《册府元龟》卷629—641)。成自虚家彭城,为河南道徐州府治所,“西至上都二千八十里”^{[13]224},以当时乘马日行60至100里计,每一次进京赶考跋涉道路里程也需20天至1个月左右。王洙居邹鲁,路途之远近与成自虚相差无几。当时应举人多数都是在冬初前去、夏初返回,严寒酷暑自不待言,此外还有许多来自自然与社会的无法逆测和防备的风险与威胁。两京大道是彭城也是邹鲁进出京师的必经之途,成自虚的归路恰好是王洙的来路,成自虚的惊恐遭遇又何尝不会是王洙的经历与遭遇,成自虚的辛酸感慨无疑也会是王洙的辛酸感慨,同命相怜者最易有思想与心灵的共鸣,于是逆旅相逢,共话往昔“辛勤往复之意”不仅成为必然,也具有了更为广泛的意义。王洙“元和十三年(818)春擢第”^{[11]109},其最初参加科举未知始自何年,但元和八年(813)时已在赶考路上,仅从此时算起,如每年一赴选,往返赶考路至少也在4次以上。成自虚参加过多少回科举,小说未有交代,但仅此“辛勤往复”4字就足可反映出其状况也未必强于王洙,以此而论,王洙的坎坷可能也是成自虚的坎坷,尤其是元和九年(814)春的这场科考,不管是弃考了,还是落第了,再一次求仕失利乃是2人相同的遭遇与结局。

在篇章结构上,小说可为3大部分:第1部分是序曲,内容是交代故事来源和讲述背景,引

出主要人物；第2部分是故事主体，内容是展开雪夜遇怪的情节；第3部分是故事结尾，内容是揭示真相，说明后果。

纵观全篇，故事是由科举而引出，发生在科举路上，是参加科举人所经历，进士成自虚是贯穿小说始终的核心人物，为求仕而备尝道路的艰难险阻，是全篇的核心内容以及主要叙事脉络与线索，其余人物与情节皆是对核心人物与核心内容的烘托陪衬和强化延伸。

故事由何人所讲、讲于何时、因何而讲、所讲为何，能够抓住这4个关键环节，小说的思想主题就不难理解与概括。“长安城东洛阳道，车轮不息尘浩浩。争利贪前竞着鞭，相逢尽是尘中老”^{[11]110}。卢倚马名下的这首诗是道途人言道途事，发道途感慨，因之，在全篇中又具有浓缩内容和重点揭示主题的题眼地位与作用。两京大道作为一条名利路和求仕路，见证和纪录了无数士子求仕的经历与悲辛。其景象是“车轮不息尘浩浩”，各类人等驱驰奔竞，争先恐后，摩肩接踵，蔚成大观；动因是“争利贪前”，熙熙攘攘，奋勇向前，无不是为名利所驱使；结果是“相逢尽是尘中老”，都在无休止的辛苦奔波中老去容颜，徒掷青春与韶华。八怪中纯以羁旅为生的骆驼、牛和驴，现身故事中时都已是生命迟暮，来日无多，或“贴腹跪足，僂耳齧口”^{[11]114}，或“连脊有磨破之处，白毛茁然将满”^{[11]114}，都只剩“残命未舍”，境况可悲而又可怜。牛、驴、骆驼固非人类，但拟人化的人物刻画使它们具备了人的影子与镜子的功用。比之于牛、驴、骆驼，同是年年岁岁奔波于道路之上的王洙、成自虚可能此时即便未至暮年，但长此以往也终将难逃老髦衰病的那一天，这些役畜衰残病老的现状也会是他们所面临的最终结局。

求仕道路的艰辛盖缘于求仕之事的艰难。虽然开科取士无时不有，但年年岁岁都是上第者寡，落榜者众，真正一举成名的少之又少，天下士子为仕进二字可谓受尽摧残与折磨。开元十八年（731）门下侍中裴光廷就曾指出：“以选人既广常限，或有出身二十余年而不获禄者。”^[16]以辞赋闻名于时的公乘亿“垂三十举”（《唐摭言》卷八）^{[15]1648}始登第，公乘亿之流总还算幸运者，还有太多的人或客死道路，或老死科场，

穷其一生而未能博得一官半职。“来往非无倦，穷通岂易齐。”（郑谷《潼关道中》）许许多多的文人士子都曾述说过求仕的艰辛，特别是所遭遇的失败、屈辱和痛苦。《东阳夜怪录》则是以小说形式和一个看似荒诞的故事来表达同样的感受。

描写往返科举道路经历的艰难困苦、意外惊吓与莫名屈辱，反映求仕者从身体到精神所遭受的折磨与痛苦，发泄求仕失败的抑郁和悲伤，是这篇小说着意表达的思想主题。如借用小说语言来概括，亦即所谓“辛勤往复之意”。

“两京大道多游客，每遇词人战一场。”刘禹锡这首著名的《送王司马之陕州》生动揭示了两京大道在当时作为文人士子之才华角力场与诗文传播平台的重要文化功能。《东阳夜怪录》既然是以两京大道的羁旅生活经历为题材，自然也不会排除逞才与扬名的目的和追求，这在描写对象的开拓创新以及铺陈环境、刻画人物笔触的细腻新奇等方面都有比较突出的体现。

作者有意弱化视觉表达，在一片漆黑的环境中主要由听觉表达和心灵感受去描绘场面、烘托氛围和刻画人物，使其描写难度高居同类小说之冠；猫、狗、刺猬、骆驼及其诗歌，这些未曾被反映过的内容，既凸显了唐代小说的表现力，也拓展了唐诗题材的覆盖范围；以“六出公”来称谓雪花的别出心裁，“雅论高谈，抑一时之盛事”“以文会友”“留异时之谈端”“我若不呈薄艺，敬子谓我咸秩无文，使诸人异日藐我”“弟他日必负重名，公道若存，斯文不朽”等借小说人物之口反复表达的这些为文作诗的意图，都足以反映和证明作者也有强烈的逞才与扬名心理。此种意图与内容的存在虽然没有动摇和改变小说核心人物与核心内容的地位以及主要叙事脉络与线索，但在客观上必定会冲淡和影响思想主题的集中与充分表达，从而为人们准确解读小说和概括主题增加了难度。

三、个性特征与独特价值

与同类小说相比，《东阳夜怪录》最为鲜明的个性特征或独特价值就是突出人物在故事中的主体地位和导向作用，从而比较自觉地实现了作

者的主观表达意图,没有像其他小说那样把叙事的核心和重点让位于动物或物品,使人在故事中只是作为一般的经历者、见证人而存在,不对故事发挥主导作用,由此注定此类小说普遍缺乏深刻的思想内涵。

小说不以诗而以人为叙事核心。不是为诗歌而写故事,而是为故事而写诗歌。诗话类精怪小说总体上都是紧紧围绕精怪之诗来设置人物、延展情节,以故事诠释诗歌,以诗歌统摄人物和故事,所要告诉人们的无非是在诗情泛滥、诗才喷涌的国度和时代里世间万物无不爱诗能诗,一切事物无不可以作为诗的题材,从而使小说中的诗歌内涵基本上等同于整篇小说的内涵,去除诗歌,剩下那些看似离奇怪诞的故事情节即刻丧失独立存在的意义。在这一类小说中,诗居于核心地位,具有核心价值,人则是为赏诗而存在,为解诗而服务,人虽贯穿故事始终,却只能居于从属地位,在小说中的主要作用是用以串联故事、结构篇章。《东阳夜怪录》则是紧紧围绕主要人物成自虚而铺陈故事,设置相关人物和背景,构思矛盾冲突,推出诗歌,特别是有目的地设计与主要人物相契合的精怪身世经历与诗歌的思想内容,呈现出诗歌为故事而作,故事因人物命运而发生的鲜明特征。

小说以人及人的遭遇、感受,如“自虚他计既穷,闻此内亦颇喜”^{[11]109},“自虚如此问答,颇忘前倦”^{[11]110},“自虚窃谓人多,私心益壮”“自虚赏激无限,全忘一夕之苦”^{[11]113}“自虚心神恍惚,……又不胜一夕之冻乏”^{[11]114}“自虚慨然,如丧魂者数日”^{[11]114}等来统摄精怪以及精怪之诗与精怪身世经历。同时,小说故事内涵远大于诗歌内涵。精怪、精怪诗、精怪经历在小说中都是作为反映人与刻画人的材质与手段而存在的,特别之处只在于涂抹上了一层荒诞色彩而已。

小说始终以表现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守人的核心地位和核心价值,使其怪诞的表现形式虽近似于同类小说,而思想内涵的丰富深刻却又根本有别于同类小说。由这一特点又决定了小说不是以“变异之谈”而依然是以人情世故为叙事重点,是立足社会现实来叙述精怪变异,或曰借精怪变异以言说社会现实。比之于《元无

有》等同类小说,其差异并非仅仅是“肆其波澜”^{[2]198},即只是情节更曲折一些,或描写更细腻一些而已。《元无有》以“时兵荒后,人户逃窜”为入笔,已经触及安史之乱后江淮一带农村离乱凋敝的时代景象,然却以“今夕如秋,风月如此”这样怡然自乐的心态与情调,以灭绝人迹、断绝人烟的空庄弃宅适足为精怪世界、诗歌舞台这样的浪漫故事而结束,刻意回避现实,全然不顾故事发生的时地场合,使故事显得入口很大出口很小,其中内容又十分干瘪无味,除了表现离奇怪诞,别无寓意,尤其缺乏与其时社会背景协调一致的伤时感世、悲天悯人的情愫。相比之下,《东阳夜怪录》则入口小而出口大,其中内容也足够丰富饱满,除了充分表现主人公求仕的艰辛与悲伤,笔触所及也有下层官吏的辛酸、佛教信徒的人生感悟和江湖人士(如敬去文)的道德主张以及关中及中原地区的田园景象与乡居生活气息,如“晨兴开雪径”、庄外积粪、柴栏养牛、破庙寄存牲畜与杂物等,展开的是一幅相对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其中重点是通过不同的精怪,特别是驴、牛、骆驼等役畜类精怪的身世经历放大小说的社会背景,延展小说的触角和社会内涵,增强小说反映人生坎坷、人世沧桑的厚重感,从而使人们在感受到故事怪异与新奇的同时,更感受到人物的可悲与可怜。

“岂曰语怪,亦以摭实。”(《三水小牘·王知古》)此语亦可借来作为对本篇小说的总体评价,而这是多数精怪小说尤其是诗话体精怪小说所没有达到的层次和境界。小说巧妙而恰当地处理了“语怪”与“摭实”的关系,融合了戏笔、诗笔与史笔,用荒诞形式表现严肃主题,如借八怪以言求仕道路之艰难,以喜剧格调上演悲情故事,如插入猫怪狗怪的插科打诨以营造喜剧气氛,既不失精怪小说猎奇与娱人的艺术本色,又不比政治、侠义、爱情等社会人情类小说的思想内容来得逊色,从而使其迥然不同于同时代的同类小说。由此提升了精怪小说的艺术表达能力,丰富了精怪小说的思想内容与品位,是它对唐代小说的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 [1] 胡应麟. 少室山房笔丛 [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371.
- [2] 汪辟疆. 唐人小说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 [3] 王梦鸥. 唐人小说校释 [M]. 台北: 正中书局, 1983: 384.
- [4] 徐士年. 唐代小说选 [M]. 郑州: 中州书画社, 1982: 325.
- [5] 鲁迅. 唐宋传奇集 [M].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 [6] 程毅中. 唐代小说史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234.
- [7] 董乃斌, 黄霖. 古代小说鉴赏辞典: 上 [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4: 463.
- [8] 康韵梅. 娱玩、逞才、托寓: 唐小说精怪聚会赋诗叙事探析 [J]. 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 (3): 84-94.
- [9] 李剑国. 唐宋传奇品读辞典 [M].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7: 416.
- [10] 牛继清. 唐会要校证 [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12.
- [11] 鲁迅. 唐宋传奇集 [M].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6.
- [12] 贺次君. 括地志辑校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113.
- [13] 李吉甫. 元和郡县图志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14] 张维慎. “桃林塞”位置考辨 [J]. 兰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1 (5): 71-77.
- [15] 丁如明, 李宗为, 校点. 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 [16] 王钦若. 册府元龟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7552.

The Theme and Innovative Achievements of the Novel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Night Monsters in Dongyang*

ZHOU Cheng-ming^{1,2}

- (1. Changchu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Changchun 130041, China;
2. Changchun Institute of Chinese Culture, Changchun 130041, China)

Abstract: *Night Monsters in Dongyang* is a story about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of scholars.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s an important narrative clue hidden in it, which determines the caus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tory. It is a story that takes place during the journey to and from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which reflects the hardship and sadness of the journey, it is the focus of the characters' conversation and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novel. It is a story that reflects the sorrow and bitterness of the scholars attempting to seek an official position. In the story, the protagonist suffers from hunger and cold, fright and humiliation, which leads to his physical and mental exhaustion, reflecting the loss and sadness of the official position seekers. The theme of the novel is to describe the hardship, unexpected shocks and inexplicable humiliation experienced on the way to and from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to reflect the sufferings and pains of the official position seekers from the body to the spirit, and to vent their depression and sadness of the failure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t is the most distinctive character and unique value of the novel to highlight the characters' subject position and guiding role in the story and to have a conscious subjective expression intention.

Key words: *Night Monsters in Dongyang*; theme analysis; innovative achievements

(责任编辑 陈蒙腰)